

Practic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实践及启示

★ 颜 慧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积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形势，有效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展的职能使命，国防和军队建设历经数次改革。经过改革，人民军队组织架构不断适应现代军队作战和建设新要求，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得以不断优化，军事政策制度实现与时俱进，各级组织和人员活力得到有效激发。70年来的改革实践启示我们：国防和军队改革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军事战略方针为根本需求牵引，与国家改革发展步伐相协调，注重发挥法治的规范保障作用，并把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始终。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防和军队改革 实践 启示

中图分类号：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20)05-0072-07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积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形势，有效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展的职能使命，国防和军队建设历经数次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建设和改革经验。系统梳理改革历程与经验启示，深入思考为什么改革、为什么这样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作用与意义，更好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实践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怎样建设人民军队这一重大课题，坚持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和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民解放军积极适应由武装夺取政权向保卫和巩固政权的职能转变，坚持建章立制、推进“五统四性”，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军情的建军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国内还存在不少国民党残余势力，经济社会发展百废待举。人民解放军建设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存在着规模过大、兵种单一、机构不健全、编制不统一、部队管理不正规等诸多问题，正规化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军队。尤其是经过在朝鲜战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较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①

在经济落后、人民解放军担负极其繁重任务的条件下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积极适应党执政条件下人民解放军职能任务的变化，坚持以“建设世界上优良

[作者简介] 颜慧，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的现代化革命军队”^①为总方针总任务、按照“五统四性”^②的要求，不失时机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1950年，展开统一编制和全军大规模复员工作，开始着手建立健全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和军队指挥管理体制。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确立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作出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对部队编制进行定额定型。20世纪60年代，坚持备战整军方针，对全军编制装备进行了调整整编。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推动全军进行了以“消肿”为目的的精简整编，为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这一阶段改革的显著特征就是建章立制，探索确定人民军队建设发展方向，使人民军队逐步走向正规化。通过改革，成功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军情的一整套建设路径和方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军事制度，在组织形态上初步定了型。可以说，人民军队大的组织框架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确定的，时至今日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党的十八大前，人民解放军积极适应现代局部战争要求推进战略转型，坚持消肿治臃、轻装上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几场局部战争对世界军事产生深刻影响。邓小平针对人民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③中共中央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④的战略判断，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适应战争形态发展变化，进一步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⑤的战略思想，即军事斗争准备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推动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以“消肿”^⑥为主要目的，大力压缩非战斗人员，改革陆军兵种领导体制，推动军队工作重点转移。1985年，实施百万大裁军，整编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和建立相关政策制度，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性转变。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探索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理顺装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调整部队结构编成。21世纪初，进一步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勤保障改革，优化官兵比例结构和部队结构，调整院校训练体制，加快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

这一阶段改革的显著特征是精兵合成，探索适应现代战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加强质量建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经过几次改革，人民军队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大踏步追赶世界军事潮流。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坚持整体性重塑、革命性变革，开拓走出了中国特色改革强军之路

近一个时期以来，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军事高新技术群体性突破，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演进。世界军事大国纷纷调整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大力推进军队改革，大力发展军事高技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整体起势，也对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98页。

② 五统四性，五统指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训练，四性指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14页。

③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④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269页。

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851页。

⑥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168页。

习近平和中央军委敏锐把握军事领域的重大变化,准确把握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难得机遇和时间窗口,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阔的世界视野和敢于啃硬骨头的历史担当,坚决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弊端。这次改革主要有3个阶段,即2015年展开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2016年展开的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2018年展开的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目前,前两大战役基本告捷完成,政策制度改革“第三大战役”正蹄疾步稳向前推进。

这一阶段改革的显著特征是全面重塑,解决体制性障碍以“强躯干”,解决结构性矛盾以“壮筋骨”,解决政策性问题以“增活力”,改革大开大合、大破大立,其强度、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军队史和世界建军史上都属罕见。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民军队正在进行着最为宏大的实践创新。这轮改革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清晰。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成就

70年来,人民解放军主动识变、求变、图变,边战边改、边建边改、愈改愈强,由过去的单一军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联合的强大军队,由过去“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历史证明,人民军队的力量来自改革创新,人民军队的胜利也来自改革创新。

(一)组织架构不断适应现代军队作战和建设新要求。“落子谋全局,布棋重棋眼。”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历来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中之重,其成效决定军队“四梁八柱”质量,决定军队建设效能和作战效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形成总部—大军区—部队的指挥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海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铁道兵和第二炮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初步实现了从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军队适应国家安全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先后将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撤销铁道兵和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调整总部机关,成立总装备部,调整改革装备管理体制,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精干,朝着联合、高效的方向迈出坚实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调整组建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划设5大战区,实施联合保障体制改革,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组建海警部队。通过此次改革,打破了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起了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局面,实现了军队组织架构历史性变革。

(二)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断优化。纵观世界军事发展史,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是固定不变的,必须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而变化,随着国家战略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变化而变化。否则,再强大的军队也会落伍,甚至不堪一击。

70年来,人民军队规模结构经历多次调整。新中国成立时,解放军总员额达到550万人。20世纪50年代,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经过4次精简整编,军队总员额缩减到240万人。后来,军队总员额又一度膨胀,1979年底达600多万人。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提高战斗力,就必须“消肿”,减少冗员。^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裁军100万、50万、20万,总员额控制在230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宣布裁军30万,压缩规模、精简人员,军队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

科学的力量编成就是战斗力。马克思讲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169页。

系也发生了变化。”^①70年来,人民军队坚持以技术发展驱动编成创新,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优化力量编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解放军主要加强空军、海军力量建设,建立战略导弹部队和电子对抗部队,加强陆军炮兵、装甲、工程、防化等技术兵种建设,部队摩托化、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军军改编为集团军,充实扩编通信兵、防化兵,组建机械化步兵师、陆军航空兵等技术兵种,部队火力、突击力、机动能力大幅度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坚持创新驱动,优化军兵种结构,改革作战部队编成,实行军、旅、营体制,压减集团军数量,将边防部队全部划归陆军领导管理,调整军队院校结构布局,着力打造具备多种能力和广泛作战适应性的部队,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国土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和兵力布势,改革了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制胜模式,使人民军队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编成更加科学,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

(三)军事政策制度实现与时俱进。军事政策制度调节军事关系、规范军事实践、保障军事发展,其制定与调整对实现军队建设目标、提高军队战斗力具有重大意义。70年来,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党的历史使命、人民军队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建军治军特点规律和实践要求,不断调整完善军事制度,为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把建章立制作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先后颁布共同条令草案、《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等法规制度,由此奠基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六七十年代,陆续颁布《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重新修订《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军情、具有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条令体系。80年代,按照“四化”要求改革干部制度,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等,实行新军衔制,首次建立文职干部制度、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和干部离退休制度,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对军事人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停止全军和武警的经商活动,对干部工资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士官制度、士兵服役制度、军人伤亡保险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和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有利于调动官兵积极性的政策制度框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以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为指向,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调动军事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深化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各项政策制度改革渐次展开、全面推进,紧前出台一系列备战急需、改革急用、官兵急盼的法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全。

(四)各级组织和人员活力得到有效激发。这既是军队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70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始终把提高各级组织和人员活力作为重要着眼点,贯穿于改革各领域和全过程,收到良好成效。

20世纪50年代,通过召开全国英模大会、改革分配制度、颁发勋章奖章,不仅使军人有了稳定的物质保障,更激发了他们的荣誉感和上进心。针对革命胜利后少数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现象,成立军队党的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领导和监督,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得到彰显。六七十年代,进行增强党性的教育整顿,解决了部队“软”“懒”“散”问题,端正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路线,促进了团结,部队呈现新气象。80年代,在“军队要忍耐”^②的大背景下,人民军队通过挖掘自身潜力有力保障了军队生活;实行新军衔制,授予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深入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引文源自邓小平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

展“双拥”工作，广大干部活力动力得到有效激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解放军组建军委纪委监委、政法委、审计署等机关部门，加强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力持续推进正风反腐，进一步纯正了部队风气。几次调整军人工资和福利待遇，加快形成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军人待遇体系。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军人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正在加快实现。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和军队改革形成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经验做法。其中充分体现了世界军队建设改革的一般规律，以及人民军队的特有性质和建军治军特殊规律，是中共中央建军治军思想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解放军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始终坚持党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全面领导。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国防和军队改革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矛盾顺利推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纵观军队历次改革，无不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亲自领导、亲自决策、亲自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为改革强军把舵定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为人民解放军组织形态整体重塑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坚强保证。实践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核心问题，抓住了党的领导这个核心和关键，国防和军队改革就能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当前，人民解放军正处在改革落地攻坚期、组织机构磨合期、转型发展爬坡期。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要把党的领导突出出来，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化理论武装，使全军官兵坚定“四个自信”，强化“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锻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进一步走向严紧实，为新体制的高效运行和持续深化军队改革提供可靠政治保证。

(二) 始终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人民军队能在改革中不断革弊鼎新、凤凰涅槃，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先进理论的指导。70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国防和军队改革始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的建军道路，科学回答了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军队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科学回答解决了在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军队如何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国家安全问题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日益增强，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提高军队军事能力显得更加紧迫，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对国防和军队改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航强国强军征程中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怎样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为改革提供了正确引领。

实践证明，国防和军队改革要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行、高歌猛进，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导。目前人民军队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要将改革顺利推进，就必须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根本指南，在实践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对新课题不断从理论上作出科学回答。

(三) 始终以军事战略方针为根本需求牵引。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打赢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根本目的。70年来，人民解放军坚持以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提高战斗力、打赢未来战争为根本目标，设计和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20世纪50年代，中央军委提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明确了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为主的作战形式，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作战方法。这一阶段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提高军队机械化水平为重点，加强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建设。80年代后，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制定和调整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要立足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

争。这一阶段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主要提高军队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调整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在战略方针的根本需求牵引下,从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政策制度等全方面发力突破,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实践表明,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对军队未来的设计。新时代,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并以此为牵引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准确把握国家安全需求,以能打胜仗的要求筹划和推进改革,为实现军事战略目标、履行军队使命提供坚强的体制机制保障。

(四) 始终坚持与国家改革发展步伐相协调。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坚持与国家改革发展相协调,服从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就能借势起力、事半功倍。

20世纪50年代末,军队总员额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50万人缩减到249万人,相继推行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改革,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逐步下降,同时广大官兵的工资待遇有一定幅度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在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同时,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向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方向转变,强调军品贸易和军品采购、军队后勤供应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等,这些都体现了国防和军队改革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改革大局的战略考量。20世纪90年代,中央军委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①,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相衔接和配套的,形成了两者良性互动的局面。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单独作为一个部分写进全会《决定》。^②

历史表明,国防和军队改革,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安全需求,又要兼顾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始终在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着力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更深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资源、聚合力量,努力形成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五) 始终注重发挥法治的规范保障作用。改革的推进需要法治的力量来护航,改革的成果需要法治来固化。70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注重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形成共识,也注重以严明的组织纪律来约束各层级和各领域行为,严格按照法规制度明确的责任、权力和义务规范各项改革,坚决维护改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改革得以行稳致远。

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规模大、范围广。中共中央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1958年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将八总部调整恢复为三总部,还出台了共同条令、《军官服役条例》《兵役法》《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等基本法规制度,改革“震荡较小、成绩较大”^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要求军队所有方面都要订出章程,以统一全军认识和行动。20世纪80年代,陆续制定了两百多件军事法规及其法规性文件,军队各项法规制度得到迅速恢复和健全,各项工作走上正轨。20世纪90年代,修订颁布的《内务条令》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④写入其中,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治军理念和方式实现了新的突破。进入新世纪,在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坚

^①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指,第一步,到2010年,用十几年时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主要解决好军队的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费的相应增加,加快军队质量建设的步伐,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③ 《谭政同志的发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17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

持从严治军，健全军事法规体系，提高依法治军的水平”^①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解放军把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第三大战役”，着力提高国防和军队法治化建设水平。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改革和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新时代，要始终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坚持立法同改革相衔接，深入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发挥法治的引导、推动、规范、保障作用，确保国防和军队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六）始终把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始终。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70年来，人民军队始终注重发挥政治工作这一最大特色和优势，引导官兵自觉站在全局高度认识改革，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正确对待利益调整，积极拥护、支持、参与改革。

20世纪50年代，军队在高中级干部中开展“系统、联系实际、稳步前进”的政治理论教育，深化对毛泽东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等重要思想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前后，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潮，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②，领导干部下连当兵，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国防和军队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军广泛开展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四有、三讲、两不怕”^③等活动，提高广大官兵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能力，强化服从国家和军队改革事业大局的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在部队广泛开展“四个教育”^④“三讲”^⑤活动和人民解放军历史使命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战斗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以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等教育活动，确保了部队“打得赢”“不变质”，为国防和军队改革顺利推进发挥了服务保障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开展“学习践行强军目标、做新一代革命军人”“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等主题教育，为国防和军队改革营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坚强保证。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引领是最根本的引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政治工作必须坚强有力。新时代，要做深做实改革中的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官兵统一思想认识，坚定改革信心，投身改革大局，做改革的促进派和推动者，凝聚起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杨 涓]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第128页。

② “四好”连队是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指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

③ “四有、三讲、两不怕”是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④ “四个教育”是指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

⑤ “三讲”是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